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革命名分的诱惑——《上海文革史稿》导言	李 逊
【春秋史笔】	邂逅韩受晶，再说戚本禹——史实的层次	胡鹏池
【史实辨析】	戚本禹的回忆——不堪推敲是病史	拾月霜寒
【亡灵祭坛】	那些留在大陆的民国精英的人生结局	米 糕
【抗拒遗忘】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朱大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革命名分的诱惑——《上海文革史稿》导言

• 李 逊 •

1966年8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说文革是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不仅因为其破坏性，还在于其荒唐性。它的阴影，至今没有消失；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破坏，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法消除。如今，熟知这段历史的人物正在渐渐老去。当年的权力中心“四人帮”也已全部离世。但真相始终被掩盖和扭曲，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历史更添无数问号。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为时十年的文革正在被刻意忘却，或者被定格在四人帮挑动、造反派迫害的平面思维。历史仿佛失忆失踪，几句简单的描述和解释，涵盖了所有的真相和记忆。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忘却而不重演。文革的幽灵，在文革结束后的近40年来，始终固执地时隐时现，有时附民众的怨气表达，有时借官方的言论还魂。文革被刻意遗忘的，恰恰是其反普世价值的本质，更是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和制造者的责任。

这本书的内容是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由于官方史料的不开放，无法了解上层政治。所以我的选择，更多地侧重于底层的群众运动。上海文革是中国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层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是其最大特点。文革群众运动由两大部分组成：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工人造反派运动，以上海为典型。红卫兵运动，到1968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工人造反派运动，到1968年“大联合”也基本结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过组织的体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干队伍，在上海的文革政坛活跃整整十年。除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还有一支其它省份城市都不拥有的文革力量：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股势力左右着上海的舆论，对全国的舆论也起着重大影响。上海的文革就这样与中央文革派紧密相连，从1965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1976年的未遂武装反抗，始终为毛泽东的文革寻找突破口，忠实地实现毛泽东的心愿。

◇ 思路与方法

隐藏在本书整个叙事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我追溯的是历史的初始动机和逻辑。每个章节的叙述背后，都有这样一条主线。许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我希望通过细节，寻找历史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历史是由细节组成，没有细节的历史有时可能有着巨大的黑洞。我试图拼接我所能得到的碎片，重新梳理这段历史。许多细节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有些是为了再现场景，有些是希望能为学者和后人的研究提供关注点。我而且希望能尽量再现文革参与者的轨迹和形象，他们也是历史的组成。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以及我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可能和主流的叙述和体例不一样，但这是我对历史的感觉。

忠于史实的根本，在于一切从史料出发。而目前对于文革的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不足。这不仅包括档案的不开放，也包括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监控。这使得任何人的研究，包括我，都不可能全面深入。在撰写过程中，非常多的时候，我苦于没有资料，尤其苦于看不到当时的文书档案。有些事其实只要查一查有关会议记录或简报，马上可以真相大白，但是不可能。而等到档案开放，又将等到何年何月？我只能寻找当事人，请他们回忆那段历史，解释自己当时的动机；我并且查阅文革时期的报刊文件、传单小报，以及文革后的清查、交代；我也关注每一本或每一篇新出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书成稿之后，我请当事人核对史实，尽量在史实方面求得当事人的认可。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的稀缺，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说法与主流叙述不一致，我尽量找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对照，努力爬梳出真相。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收集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史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最基础工作。

对上海的文革研究，我的关注点不只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等大的政治事件，我而且关注文革的其它方面，诸如老保组织、大联合、科层精简、转型后的群众组织、后期造反派、写作组、第二武装，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我的研究无法深入，但我希望以这样的扩展，抛砖引玉，引起其他研究者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我也希望能为过来人重演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历史场景。

在研究整个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的同时，我对等级身份制在文革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特别感兴趣。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学者研究。我的不同在于，将1949年后各种等级身份，归为体制和政治两大类，并且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等级身份和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比起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两个更宿命和无奈的不平等。这两种身份体系，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的等级身份的分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的能量来源分析。这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两类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形成了独特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成为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到文革前，两个体系日益强化，成为统治中国老百姓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 体制身份——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等级身份中的第一大类是体制身份，与户口和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及编制有关；还有地区差别、城市等级差别，等等。基本属于经济层面，体现的是经济分配关系。是中国当时经济体制下的特有身份，可以统称为“体制身份”。

体制身份中的第一种与户口有关，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优越而世袭，“农村户口”是贫困的同义词。而城市也有等级，依据城市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划分行政级别：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专区）级市，专区所辖县级市，以及县城、镇，等等。直辖市等级最高，县以及镇的城市等级最低。此外，全国分为十一个工资区，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文革前，上海市区职工工资属于八类地区，基数在全国比较高；相比之下，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区只有五类。上海郊区十个县，九个县属于五类地区，还有一个崇明县属于四类地区。所以在上海郊县，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要比市区同类低约9%左右。

第二种体制身份与编制有关：即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又分各种等级。机关干部有行政级别，其他属于干部编制的大学教师、文艺文化工作者等，都各有相应的等级。在工厂，技术人员和科层管理人员也属于干部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实际身份最高的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干部的等级是最森严的，被定为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注）各种级别的“待遇”十分分明。十二级以上属高级干部，单是看病，就可以进只对高干开放的华东医院。

工人编制，实际就是第一线干活的工人。工人编制中有各种技术等级：最高八级，视各类不同工种而定。有些技术工种最高八级，有的只有六级、七级，等等；或者根本没有技术级别，只被算作辅助工种或简单工种。和干部的级别比起来，工人的技术级别只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只有责任和工资的差别。不像干部级别，不但是责任和工资的差别，更是权力、权利、待遇的差别。

第三种体制身份与所有制有关。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体制外的差别。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终身职业保障，带薪事假、病假、产假，连同家属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劳保”，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继续享受医疗保险，死后还有丧葬补助费，等等。甚至在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也远比其他所有制要优越许多。总之，真正是生老病死有依靠。集体所有制中，上海还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作为区县政府的工业部门或文教商业等部门管理的大集体，职工的起点工资，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10%左右，退休工资也低许多；医疗保险是只保个人不保家属，或只保家属费用一半的“小劳保”，等等。不过尽管工资福利较全民企业稍差些，但就业一般较稳定，近乎终身制。而归街道管理的小集体，职工收入更少，且没有医疗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更不是终身制。

城市职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是处于体制外的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他们就业无保障，无法享受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是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

以上所有这些身份，都与体制的结构性框架有关。本来，在哪个行业工作就是那个职业的身份，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由收入、知识和技术含量等因素决定。但所有制身份将职业身份再分等级，成为职业身份的附加值。

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他们有关的少得可怜，劳动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大多数人的生活最苦、收入最低。这样的体制身份，使得将农民成为社会地位最低的职业身份。

体制身份后面除了经济权利，也有政治权利。全民所有制工厂的职工被划作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国家骨干企业的基本阶级队伍。他们可以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分无此权利。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能参加工会，也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有这些体制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地区户口，随父母而定。改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是最难的。有些体制身份是被后天分配的，如所有制单位，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决定。这第一次分配几乎定终身，以后若要改变也非常困难。还有编制身份，工人编制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因为干部编制属于非生产人员，尤其在工厂，名额很少，属于稀缺资源。工人要上升到管理层，第一个关口，就是变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只有改变了编制，以后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待有了干部编制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政府一次性分配，而且基本是单向和封闭的，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靠个人努力改变被分配定了的体制身份非常困难。于是在当时这个大力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却有着最多的宿命、无奈甚至绝望。

◇ 政治身份——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等级身份中的第二大类是政治身份，由阶级斗争理论派生。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给每个人派定的政治等级身份。它属于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领域，体现的是政治权利。

在各类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阶级成分，也称本人成分，是由阶级斗争学说划分出的第一种政治身份。共产党执政后，以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定位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划分出敌、我、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上被划为“同盟军”的农村贫农、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宪法规定的。属于革命阶级的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即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地主和富农，则是敌对势力，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按阶级斗争学说，也应是革命对象，但由于共产党对其采取“团结、赎买”政策，所以被作为“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这样的身份，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个人职业而来，由职业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从业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而划分，本来应该算作职业身份。但是阶级斗争学说，将各种不同职业，划入各种阶级，职业身份成为政治身份。

在阶级成分中，等级最高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中农，文革中被称为“红五类”。等级最低的是地主、富农，是实际上的贱民。两个对立的等级之间，是“职员”，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上中农等。这些中间等级的阶级或阶层的地位很暧昧，有时是革命对象，有时是“团结对象”，全由政治运动的指向决定。至于许多1949年前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要职者，虽然成分算作职员，但被作为“历史反革命”，也是等级最低的贱民。

被阶级分析的还有“家庭出身”，这是个与生俱来的宿命身份。阶级成分主要与本人过去的职业身份有关，加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家

庭出身的划分，则完全被父亲的阶级成分决定，是个由阶级成分派生出来的先天政治等级。同一个性质的，还有“社会关系”，也即家庭成员或亲属的阶级成分。

第二种政治身份，是各类“政治面目”。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主党派。党员自然是革命的领头者；团员也是被信任的。群众，则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对象。民主党派是“团结”对象。

第三种政治身份是被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划分出来的，名目繁多。例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等。此外还有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字面理解，就是“现在正在行动”的反革命，其实，大多是反执政党和政府者，甚至只不过是有点意见牢骚者。“坏分子”，主要指那些触犯刑律被关押劳改后的刑满释放者；还指虽没触犯刑律但触犯当时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者，例如“流氓阿飞”、“投机倒把”者、“乱搞男女关系”者，等等。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坏分子，文革前统称“四类分子”。文革中再加上右派，统称“地富反坏右”，又称“黑五类”，与“红五类”对应。不久，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称为“黑六类”，或者“黑七类”、“黑八类”。革命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多。

以上三项内容，都是共产党执政后，各种个人登记表格中的必填项目。而第四种政治身份，则是登记表格上没有的，却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有可能记录在个人档案中。这就是“政治表现”，根据各个政治运动中的不同标准或称谓而定。总体来说，不外乎“积极分子”、“依靠对象”、“落后分子”，在学校中还有“反动学生”，等等，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实政治身份。在这方面，干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分配“政治表现”。尤其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根据各人表现，进行政治排队，给每个人贴上每场运动新制定的政治标签。这类政治排队，一般都会在运动后期塞进个人档案。以后，事主的提拔、培养等等，都会受到档案的影响。

政治表现与历次政治运动对象一样，是最具弹性的政治身份，尺度全由各级干部掌握。不同处在于，后者是公开的，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前者是不公开的，是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的靶子，当事人可能毫不知晓。

所有被视为敌对和可疑的对象，都由各级党组织掌握，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有选择地抛出。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阶段和红八月抄家批斗阶段，许多人都是被单位党组织抛出个人档案内容，成为批斗或抄家对象。这样的制定运动对象模式，到1966年底，因为批判走资派和夺权而暂时有所改变；但到1968年开展的“清队”，又重新恢复并继续。

在政治身份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还有社会关系，都是被先天派定的；而后三种政治身份：政治面目、运动对象和政治表现，则是按政治态度也即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拥护程度划分的。这为个人选择留下空间。尤其政治表现，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争取，诸如“积极分子”、“依靠对象”，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先进人物称号：“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三八红旗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等。

◇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分”

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

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将其中最可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精英，隔离在最不确定的等级；将最有活动能力的前政府时期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隔离在最低的等级。当政者用隔离各种生存空间和政治倾向的方式，不使各类阶层群体和各种思想意识产生纵向联系，以便于分而治之。

从表面上看，政治等级身份不像体制等级身份那样，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政治身份体现的是与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而不是经济分配关系。所以更像是一种被指派的外在身份，一种名义上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说是一种名分，一种由执政党分配的政治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名分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简言之，名分中的“名”，是个体的人在人际和政治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位置，例如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和规范。而名分中的“分”，则是与“名”对应的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因此，名分实际就是身份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和人际等级关系，核心是“礼”；也即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由此构建了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秩序。

传统社会的名分，以及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名分，实质都是为了治民。与政治名分相似的是：传统社会的名分，大多也是一种名义上的身份。而有了名义上的身份，则可以相应得到或转化为其他利益。但是，政治名分与传统社会的名分也有不同。主要在于，1949年后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是国家强力推行的；各种政治名分，都是执政党通过各项政策和运动，由各级党组织强行分配给每个人。而传统社会的名分理念，是通过教化施行影响而强化的，并不伴随着完整严密的国家制度。国家虽然也给忠于朝廷者赐予各种名分，但国家并不直接分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名分；各种名分主要不是由各级官员派定，而是礼所规范。

看起来，所有政治名分中，工人阶级的等级是最高的，农民的等级也不低。但真正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也即干部阶层，以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划线。由于基本都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着所有的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光是从工资收入，就能比较出干部和工人的实际等级：工人中的最高工资，是八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在上海是105元至118元（各个行业不同，轻工业和纺织等系统稍低些，重工业系统最高），只相当于16至17级干部的工资。此外，各种文件的传达包括信息的传递，干部总是最先按级别逐级知晓的，工人、农民却总是最后才被告知。

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地位，还可以从对人的处罚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人的最重处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便是革去城市户口，发配农村当农民。即使不下放农村，下去劳动也是严重处罚。所谓“下去劳动”，实际就是下去当工人，干工人的活。由此可见工人的崇高地位严重名不副实，农民实际地位最低，完全是个空名分。这反映出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体制结构的巨大矛盾。

◇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分的关系

所有的政治名分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因为名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各种体制身份有着不同的经济权利和待遇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名分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包括话语权、信息权，政治参与权。具体来说，就是说话的权利、听文件的权利，参加运动的权利，入党入团加入工会的权利。此外还有居住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等。

本来，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是两个层面或范畴的身份。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原则上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范畴。但由于1949年后，所有的资源——有形和无形的，越来越集中到执政党手里，各种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向政治层面的政治名分倾斜。使得原本只是政治态度或政治地位的政治名分，越来越成为被分配各种资源的考量。到1960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出身、成分和政治表现越来越成为考察和选人的主要标准，包括大学和重点中学的录取标准。作为权利的“分”，越来越和政治的“名”紧密相联。换言之，现代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据“名”的等级而酌情给予的。

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光有能力、职业和名声还不够，还要被认为“可靠”。那些政治积极分子，会被看中培养或提拔，工人编制可以转为干部编制进入科层甚至权力机构，农村户口有可能“吃上公粮”，被安排公职转换为城市户口；学生的毕业工作分配，有可能被留在等级高的大城市，获得好工作。文革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取消城市户口。他们要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只有通过被推荐招工或上大学。这样的机会，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子女来说，必需用政治和劳动表现换取。而劳动表现，在文革中被政治化，是政治表现的具体体现。在工厂，对科层管理人员的提拔也是这样。尤其从工人中提拔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政治表现好”。王洪文文革前从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厂保卫科干部，编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就是因为政治表现符合主流要求。王秀珍文革前，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被报送进上海的专科学校学习，也是因为她出身好，加上政治表现好。

一般来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能力、职业、财富、权力、名声、出身等因素组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各有侧重。其中最能体现个人选择和特点的，应该是职业身份。但是，1949年前的职业身份变成了政治身份中的阶级成分，1949年后的职业身份又与难以变更的体制身份捆绑。加上个体对从事何种职业，越来越没有选择权利，到文革前夕，职业身份如果没有体制和政治的优势，已经无法对社会地位起决定作用。例如同样是教师，集体所有制民办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无法与全民所有制学校的老师相比。还有政治名分，也越来越成为职业身份的重要附加值。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只有被认为是革命的，也即有了革命的名分，才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名分降低，那么体制身份也有可能降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对象最后都会被处理。那些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许多是专家、学者、文化人或干部，成为打击对象后，社会地位骤然降低，不但失去原来的工作，而且失去在大城市的居住权，“下放”去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甚至驱逐去农村劳改，被取消城市户口。更多人则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工资降级。文革初期，北京就发生过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出北京、遣送去农村的情况；上海虽然规模不及北京，但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

所以，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也可以降低体制身份。而在上文所述的两大类身份中，虽然体制身份中的户口最为“宿命”，编制也几乎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但在政治身份中，还是有着个人选择的正负空间。政治名分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但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甚至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中最难转换的户口。在这方面，个人的政治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更是关键。不但日常的政治表现，每场政治运动，更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名分变更的机遇。因为这是向执政党表现自己忠诚的最重要机会。与此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或者政治历史被认为有问题者，则有可能被抛出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从而被贴上各种负面政治名分。背着这样的政治名分，动辄得咎，没有希望，没有出路，还有可能被打入底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放逐农村，甚至判刑、劳教。每一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中，这些人都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和冲击对象，而且累及子女甚至第三代，永世不得翻身。巨大的人生代价，使得很少有人敢于以自己乃至后代的人生作抵押，去对抗执政党。人们不得不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挣得标志着被信任的政治名分。

这是革命名分的诱惑，也是反革命名分的威慑。政治名分和所有制身份之间的这种转换，就这样成为最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是共产党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能量，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结果。

◇ 文革中的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之争

1949年以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分的不断划分。由国家政治体系层层布置，自上而下地鉴别和划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重新鉴定政治名分。于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也为每个个人提供了提高政治名分的机会。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

文革前，评定政治名分的坐标系，纵向轴是时间——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年份，参加得越早，等级越高；横向轴的是对执政党的态度，即是否“听党的话”。文革中，文革派试图实行新的名分规则：时间改为1966年的文革，造反越早，名分等级越高；横向轴由听话顺从，改为“敢于造反”，这成为文革中上海对干部的考察和提拔标准。这是文革政治名分与十七年的不同之处。不过，这个不同只是“听话”对象的不同。文革虽然暂时可以不听各级干部的话，但必须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这是文革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自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

文革初期，许多造反者都自认是紧跟党的积极分子。但实际上，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分，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真正被各级党组织认定的“政治表现”相去甚远。当他们给干部们贴大字报时，干部们会抛出他们个人档案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反击。这些内容包括偷偷记下的他们过去的言论，或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例如张伯生平时的玩笑与闲谈，谢鹏飞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运动初期各个学校和工厂频发的“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初的对干部暗箱操作、划分政治名分的冲击，也是对干部划分群众政治等级身份权力的反抗。“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干部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分，反攻倒算。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超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抄家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时期，是执政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且针对的是革命对象。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质疑他们的权力。这个挑战执政党严密控制民众制度的造反行动，是之前所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在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成为新的政治名分。以往的那些政治名分：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历次运动积极分子，等等，在文革初期全部成为“运动阻力”的代名词，暂时失去了以往的荣耀。由以上几类人物组成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干部斥为“队伍严重不纯”。但是，尽管这几类人员文革初期的政治名分似乎降低了，一时不如造反派，但党员、劳模先进人物等政治名分的含金量还是实际存在。毕竟文革前的入党标准非常严格。能入党者不但政治表现要好，其它方面也必须突出；吃苦在前自不必说，还必须是道德楷模。群众基本认可这样的标准。劳动模范的评比也是这样，工作必须十分出色。所以，尽管文革中一方面批判党员及劳模先进人物的“奴隶主义”，也即缺乏造反精神；另一方面造反派中的党员，却比其他造反派更受到信任。毕竟入党就是对政治和道德的筛选。于是，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身为党员的王洪文会当选为负责人；而继续北上告状的二兵团的前身北上大队，在北上途中推举负责人时，会呼吁“共产党员站出来！”

王洪文虽然是造反派，但他对党员也是更给予信任和推重。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马上要人去基层厂挑选党员造反派。党员——文革前的带头人，造反派——文革中的革命者，在王洪文身上得到交汇。这也是王洪文以后被毛泽东看中的重要原因。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另

外两个骨干人物王秀珍和金祖敏，也都是这两个革命名分的兼有者。他们两人也都被提拔重用，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

此外，由于文革虽然是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分层，但分层标准却仍然延续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思维。所以，政治名分中的出身、成分效应继续存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批斗，都是针对十七年的革命对象。而且出身不好者，甚至连参加文革的资格都没有，马上会遭到大字报反击。工总司的潘国平、黄金海、谢鹏飞等最初造反时，都被贴大字报，说他们出身不好，意即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干脆将出身简化为“红五类”和“黑五类”：前者被封为“自来红”，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后者被称为“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挨批判斗争的份。此种政治等级观念，即使造反派也不能免俗，加入造反派时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出身不好者自己也会觉得名不正而矮人三分。谢鹏飞被大字报揭发说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后，在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主席团成员，推荐了别人。

文革中新的革命名分“革命造反派”，甚至超过了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政治名分。过去的积极分子，只有在宣布造反后，他们之前的名分资源优势才能够延续到文革之中。因为过去的积极分子都是原来的干部培养提拔的，他们和那些干部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当这些干部被作为文革对象，他们培养的积极分子，自然被视为文革阻力。所以许多过去的劳模先进人物，还有党团员、积极分子，在一月革命造反派大局已定之时，都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表示要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以这样的表态，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自己的革命名分。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名分，而且还提高了体制身份。例如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她因此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车间挡车工人；文革中她当上普陀区委书记，体制身份得到了转换。

政治名分的实际价值，靠体制身份的转换体现。如果一辈子只有积极分子的名分，体制身份没有转变，那么除了有可能在评工资时被评得高些，这个名分几乎是空的。文革前，只有像王洪文那样，被从工人转为科室干部；像王秀珍那样，被送去专科学校培养，毕业后成为技术人员，政治名分所携带的附加值才得到兑换，才是名至实归。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凭着“领导阶级”的名分，大批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党政机构，成为党政干部。王洪文是其中升得最高的，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如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陈阿大等等，也都从普通工人成为市级领导干部。革命的政治名分就这样为体制身份的转换，提供了最坚实的条件。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们最焦虑的，就是干部们对他们身份转换的抵制。他们希望以革命造反派的名分进入各级领导位置，从工人变成干部。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

但是，文革中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的转换是不完全的。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们，人事关系仍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工资也由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他们只是被“借调”去担任新的领导工作。即使当了干部甚至市革委会上层干部，职业变了，但编制仍然是工人。甚至王洪文，当他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资仍是他当厂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04元（毛泽东工资以行政干部24级第一级算，应是610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自己要求降低到404元）。王洪文去北京后，工资不够开销，只好由上海市革委会给他补贴。而那些被打倒的干部，以及被驱赶去干校劳动、去工厂“战高温”的干部，他们的政治名分虽然一时降低，工作一度被调动，但他们的编制始终没有被变更，始终保留着干部编制。许多干部即使在被批判期间工资“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

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这样的处理与文革前不同：文革前，干部如果被降职，一般会被相应降级降工资。

文革前，工人被提拔为干部，编制和工资也会随之转换，成为干部编制和拿干部工资。文革中，被提拔为干部者都不转换编制，工资也不相应增加。所以，他们虽然成为干部，但只要编制不变，他们的身份转换就没有最后完成。这是与文革前干部提拔制度的显著不同。这种状况，使得那些被提拔的工人一旦犯了错误，立即被打回原形，说声“下去劳动”，就被一撸到底，回原工厂重新当工人。而对于干部编制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层人员，即使去干校或“四个面向”，保留的干部编制，使他们保留着重回科层和领导岗位的可能。事实上，到文革后期大批干部也确实回到了机关。两边的身份转换，都停止在编制，都没有名至实归地最后完成。如此只改变职业，不改变编制，初衷可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底层即使向上层流动，也因没有完成体制身份的最后转化，面临随时重回底层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

政治名分在许多时候，需要编制身份的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名分，只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才具有。而“产业工人”的政治名分，更只有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才拥有。到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的名义地位上升到顶点。对文革新干部的提拔，有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名分是个标准；但若要再提拔到上层，有没有产业工人所必需的全民所有制编制身份，也是重要标准。在一次讨论市革会的女委员人选时，王洪文提名同是老造反的徐美英和王秀珍。但徐美英是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算不上产业工人；王秀珍工作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属于最正宗的产业工人基地。尽管王秀珍是干部编制，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但张春桥最后挑选了王秀珍。而许多工人对自己“工人阶级”的名分也十分珍惜。当被调去科室或各级领导职位时，他们担心自己会不会从此变成“当权派”，不再被算作工人阶级，从而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对象。

文革又是1949年后，唯一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分层的运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各级干部给群众划定政治名分。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造反有理”，就是群众有权评判干部。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各级干部们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在整个文革中此起彼伏：最初的批判对象“牛鬼蛇神”之类，是干部们的目标；不久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到清队，干部们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名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1966年下半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争，实际就是底层群众与干部争夺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从1966年下半年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这个争夺完成。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转移到群众手里，哪些干部是走资派，哪些干部是叛徒、特务，还有什么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决定权在群众。而且群众还可以决定哪些干部是可以“解放”后被三结合的，哪些干部靠边暂不使用，哪些干部挂起来继续审查。不过，这个时间段不长。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67年底结束。随着党政一体化的各级革委会建立，政治名分划分权由各级革委会掌握。1967年年底开始的清队，对名分鉴定的权力又重新回收，清队对象重新由革委会也即各级权力系统决定。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尚未恢复活动，革委会尚未建立权威，所以这一鉴定在许多单位，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帮助革委会重构权威。

文革也是共产党执政后，底层民众自己给自己确定政治名分的唯一时段。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就是新的革命名分标准。对照《十六条》，群众对自己政治名分的认知与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于是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正是毛泽东文革动员的巨大资源和

能量。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都要求各级党组织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到了1967年初，干部的权威下降到底点，造反派组织无须干部们的承认，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频繁的批斗大会，就是自我身份鉴定的表演仪式。由于没有了鉴定权威，群众只需自我鉴定，或者得到其它组织的认同。于是许多组织都想争夺革命名分鉴定标准的话语权，生怕别人给自己作鉴定。派性，就是对政治名分鉴定权和鉴定规则的争夺战。赤卫队，一、二、三兵团等，就这样被取消革命名分，没有了存在权利，大小武斗纷纷而起。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名分，但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争取体制身份的要求，这就是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人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或改变体制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操分配大权的干部们，要求他们放松或改变分配体制身份的政策。于是1958年后因“大跃进”造成持续三年严重经济衰退而被辞退或动员回乡的职工，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并恢复工作；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恢复上海户口；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要求转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改为大集体所有制。体制外的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连工人阶级的名分都没有，于是他们先要求工人阶级的名分，希望正名后再要求享受体制内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等。实质都是要求体制身份后面的那个经济利益分配的“分”。

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虽然反对由掌握实权的干部划分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但这些反对行为，始终没有跳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体制内的工人质疑自己被贴上的政治标签，但对于整个政治等级身份制度却毫不怀疑，地富反坏右始终在他们的批判和打击范围内。对于经济体制等级身份，他们也同样毫不质疑。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体制内职工造反派，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毫不手软地将他们的组织“红工”取缔。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而那些体制外工人，在争取体制身份的经济主义风潮中，虽然反对体制等级身份，但却不反对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在与市委签订要求参加文革的条约时，特地注上：“黑六类除外”，对政治贱民们没有丝毫同情，更不说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自己被派定的体制身份，不是体制身份制度。他们反对体制身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挤进体制，享受体制内的经济权益。

所以，文革虽然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名分的造反运动，但是，文革冲击的只是政治名分中的很小一个部分，也即干部对政治名分的评判权。造反派们要求的是评判别人包括评判干部政治名分的权利，不是打碎整个体系。对整个政治名分制度，文革不但没有冲击，而且强化，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曾经被打击的对象，到文革中几乎全部被再整上一圈。虽然一部分造反派试图打破家庭出身的隔离，但是打不破阶级成分的隔离。家庭出身不好者，只是争得了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至少可以得到多一点的权利，例如被推荐上大学，例如入党入团。但“本人成分”这个政治名分原封不动，对本人成分“不好”者的冲击批判，甚至比文革前有过之无不及。对于经济层面的体制身份等级隔离，文革也基本没有触动。

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身份，改变境遇，是任何一个形态国家的国民都有的心态和行为。只是，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垄断，要享有这些资源，必须表现出对执政党的高度忠诚。所以才会有中国这样的民众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名分以提高其它身份，从而获得被执政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分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应该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群众的重要原因。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越来越淡化。尤其政治名分，除了先进人物称号，几乎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职业身份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身份。人们不必再通过争取政治名分去换取利益。这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注：也有说工资等级有32个级别。但笔者认为这是工资的全部等级，不是干部的工资等级。当时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算干部编制，干部24级是他们的起点。

□ 摘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  
【春秋史笔】

邂逅韩受晶，再说戚本禹——史实的层次

• 胡鹏池 •

## 一、从“正气歌”谈起

我们这一代人从初中起就读《正气歌》，许多人反复读过，很多人并不是将其单纯作为“诗”来读，它同时也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文天祥的《正气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它不是宋玉的《风赋》，不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不是李白的“清平乐”，也不是苏东坡的《念奴娇》所能比肩的——也许只有屈原的《离骚》能与之并肩。

但《离骚》太长不好懂，故能普及并流行的还是《正气歌》。

《正气歌》开篇就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好一派浩然正气，垂墨丹青，它代表着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主流民意”，它铸就了中华民族魂。

接着讲了许多“正气”史例，首先讲的“在齐太史简”这个原始的经典的史例。

公元前548年，齐崔杼弑君光，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其次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太史兄弟以书崔杼弑而死者三人矣，其次弟仍书，崔杼知正义之终不可磨灭，乃止不杀。

在这个经典的史例中，“史实”的表述呈现了鲜明的层次性：

1.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
2.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是被杀死的。
3.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是被杀死的，杀死他的人是崔杼。

这三条都是“史实”，但是前两条刻意隐瞒了有关键意义的历史真相，这就是片面的“史实”，表面上看似似乎也不是“伪史”，其实仍然是不同层次意义上的“伪史”，只有第三条才符合那个时代的史识。

其实，按照现代的史学观念，即使是这第三层次的“史实”仍然是有问题的。崔杼为什么弑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齐灵公对他的妻子棠姜已经勾搭成奸，在他的家中要流氓。

而文天祥的“齐太史简”主要赞美的是史官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坚持真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勇敢精神。

很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当代人中实在太少了，但是并没有绝种。

在当代著名的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后，田家英说：“这样的文章打死我也不会写”。田家英的话正是体现了“在齐太史简”这样的史学精神。

## 二、邂逅韩爱晶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上午（临近中午），在深圳桑达大厦505室，周泉缨偕韩爱晶来访沈如槐。（1）

沈如槐对韩爱晶一向有看法，当周、韩二人一走进客厅沈即避入房间不予接待。笔者只好出面邀坐、倒茶，与之扯闲篇。

韩爱晶对笔者说：文革中他所领导的北航没有发生武斗，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但是 he 也被判了15年。于是他抱怨说：共产党对他不公。

北航在文革中是不是没有打碎一块玻璃？不敢说；但是北航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却是大家承认的事实。

从这一层次，老韩讲的是事实。

但是，韩爱晶所领导的“红卫兵政权”在北航有没有整死过无辜的群众？肯定是有，而且也不止一个；“北航红旗”这一造反派组织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多少坏事？韩爱晶都没有讲。

我当时出于排解他心结的动机，对他说：可是你们北航斗了彭德怀啊！

他说：是的。

我说：彭德怀是什么人？彭德怀是共产党的开国元勋，是民间老百姓所讲的天上武曲星下凡。你们斗了彭德怀，一是得罪了共产党；二是得罪了老百姓；三是得罪了天。何罪之无？

老韩朝周泉缨看看说：老胡说得也有道理啊！

周泉缨当时没有吭气。周与我虽是同派校友，但我们不熟悉。他一见沈如槐不搭理他们，就没有了情绪。

当时我们具体的对话并没有这样层次分明，但大概意思是绝对没有错的。

沈在房间里，他听着我们的对话；周坐在窗跟前，他对此有没有记忆？不能肯定。

后来，我看到韩在某些文章中曾叙述：北航批斗彭德怀的会，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打了彭德怀一耳光。对此，他也表示了悔恨，道歉、认错。

韩爱晶曾说：“比如我自己就有严重责任，辜负毛主席、周总理信任与培养。我没水平！批斗会上我还打过彭德怀元帅一耳光，给造反派抹黑！给文化革命抹黑，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2〕

当年在桑达大厦对话时，韩爱晶并没有谈到这个史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史实，否则我还会作出更严厉得多的批评与指责。

那么，老韩已经认错了，悔恨了，道歉了，这一段“公案”是不是就可以到此完结了呢？

没有！

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史料：北航的那次内部小型批斗会，参加者有30多人，彭德怀被打翻在地好多次，被打断筋骨两根。

老韩参加了这次会，但不是主持人。

老韩说他打了彭德怀一耳光。我们姑且就相信他只打了一耳光，没有打第二下；也姑且相信他除了一耳光外没有对彭德怀额外地施于拳脚。

这些我们都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都可以相信。至于老韩作为“北航红旗”的一把手，他在幕后是如何策划的？我们也可以不追究。

我们就事论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进行分析与判断：

你作为一把手，所有的“打手”都是你的手下人，他们对彭德怀元帅的殴打，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难道这不都是你默许与怂恿的吗？

所以，你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你那自己的一耳光，而是整个过程的全部殴打。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尤其是在你亲自出手打了那历史性的一耳光后，你手下的那些打手们究竟是冷静了，还是更疯狂了？究竟是“韩老六”〔3〕都已经出手了，这事就可以结束了？还是“韩老六”都已经出手了，咱们可以接着干？

你还要回答：在你出手前，彭德怀的筋骨有没有断？毫无疑问是没有，否则也可能已经停止了。正是在你出手后，你手下的打手们才更疯狂了，所以彭德怀才被打断了两根筋骨。

韩爱晶啊，韩爱晶！你的“道歉”也好，“认错”也好，如果到不了这个深度，就全都是假检查，真掩盖，不仅是蒙混历史，也是蒙混自己。

老韩的意思是说：我是有错误的，错误就这么一点点！

老胡说：不对，你的错误远不止这一点点，你的错误比你所说的要大很多倍。

从法律上讲，老韩被判了17年就已经为他的罪错付出了代价。这件事就无需再追究了。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别说假话。

你说了假话，我们就有责任戳穿你的假话。

法律上你已经承担了责任，但是在道德上你并没有及格的反省。

### 三、再谈戚本禹

每当人们批评并揭露戚本禹在“田家英命案”中的无耻表现时，戚本禹往往装着一副无辜而被冤枉的表情谈田家英对他的恩惠及他对田家英的感恩。

比如他说：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

在作了这样的铺垫后，戚本禹就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他为读者设置了这样一套逻辑：你们看啊！田家英对我戚本禹是有恩之人，我戚本禹对田家英也始终是感恩不尽的，我戚本禹怎么可能会构陷田家英呢？

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识与逻辑，人们也就会相信了他戚本禹，或者半信半疑。

如果有人说：这个戚本禹啊，真不是个东西，田家英对他如此有恩，可是他仍然对田家英落井下石？

那么就能为他作一些辩护：这不大可能吧？戚本禹在大家面前对田家英可从来都是口口声声怀恩的。

笔者就认识有这样一位长者，他就是这样为戚本禹辩护的。

你还可能为他作这样的辩护：即使戚有不好的行为，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这样一来，戚本禹当即就会顺竿儿爬：是啊！我也是无奈啊！

然后，戚就更进一步地为自己开脱：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如此这般，就中了戚本禹的奸计了，他的“中山狼”的本质就得不到昭揭了。

其实事实是田家英对戚不仅仅是有恩，有提携，有担当，同时也有阻击。

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有两点：

1. 他与逢先知是一前一后被田家英纳于门下的。从时间上戚在逢之前，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也都是戚本禹略高于逢先知，但是田家英最信用的人却是逢先知。下乡调查，田总是将逢带在身边；临时离开农村去向中央汇报，田也是带着逢，而将戚本禹扔在哪里一个人包队。这就是引起戚本禹的由嫉而生恨的原因。

就像鬼谷子的两个徒弟孙臆与庞涓，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凭什么你鬼谷子将兵法传给师兄不传给我呀？

庞涓始终不会明白自己虽然聪明能干，但人品不好、野心太大，所以鬼谷子老师对这个学生是有保留的。

2. 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本来就是一块敲门砖，遭到史学界的一片反对，同样也遭到了田家英的反对。而且，田家英一开始还让有关杂志不要登戚的这篇文章。

这样一来，戚本禹对田家英的“仇”就结大了。

所以，对于戚本禹而言，田家英不仅与他有恩，更重要的对他也有仇。

戚本禹报恩还是报仇呢？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报仇。

史实不仅有真假之分，也有多样性，也有层次之分，我们读史写史时必需明察秋毫，纤微毕现，千万不能给某类骗子骗了。

注解：

〔1〕韩爱晶、周泉缨、沈如槐均为文革名人。韩是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一把手；周是“清华四一四”总部委员，著名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沈是“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

〔2〕《清华蒯大富》P406。

〔3〕“韩老六”，是韩爱晶的外号。这个名字是周立坡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的一个恶霸地主。

□ 原载《共识网》

~~~~~

【史实辨析】

戚本禹的回忆——不堪推敲是病史

• 拾月霜寒 •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在共识网全文刊发，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戚本禹当年是文革的干将，今天仍是文革的拥趸。文革的历史，由戚本禹来讲述，可以给人更多启迪。至于其中的真假是非，世人自有评断。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有很多刻意的隐瞒和篡改，所以，不能算作信史；同时，文中也流出不少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也不算伪史。

既不是信史，也不是伪史，那么准确的命名，我个人认为，应该叫做：病史。

对这类“病史”的诊断，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只要一点逻辑和常识就足够。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中，刻意强调：“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这里，戚本禹显然是在说：江青并没有迫害人。

但是，戚本禹的回忆中记述：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

“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

“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江青）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

对于这些事件，虽然戚本禹轻描淡写，或者对江青的指示未予执行，但是，江青的跋扈，已可见一斑。戚本禹1966年进入中央文革，到1968年被关押监狱，接触江青不过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短短的十几个里，江青下达的整人指示即有数起。文革的干将、江青的喽罗不只戚本禹一人，江青弄权的时间更长达十年，那些戚本禹不知情、或者不愿提及的恶行，还有多少？

不过，最典型的例子，却是戚本禹本人的经历。这一经历，也记录在戚本禹的回忆文章里。1968年，因为被江青怀疑，戚本禹被投入监狱。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

因为“打探主人的秘密”，戚本禹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文革期间），如果这还不算迫害，什么是迫害？

而且，戚本禹记述：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

国家中央机关秘书长的任命，江青一句话就能定音。戚本禹是否意识到了：这是“家天下”的典型病态？

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戚本禹的十年牢狱不冤，如果江青再生、文革重来，戚本禹还会被投入监狱。这一次，恐怕不只十年。

戚本禹的回忆称：江青不但不迫害人，相反的，江青还救了不少人，并举出了一些例证。但是，戚本禹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江青是火海中救人的人，那么谁是文革的放火人？而为了救人以市恩，不惜把国家社会推入火海，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

对于文革中的杀戮、破坏等恶行，戚本禹的回忆称：这是“资反派”指示高干子弟做的，对此，毛主席是反对的。

高干子弟在文革期间恶行累累，这是事实，无需否认。但是，文革的暴行罄竹难书，这些暴行都是“资反派”和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当年的高干子弟有多少人？三千，五千，或者一万？暴行是“资反派”指使的，文革的暴行贯彻始终，遍及各地，已被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资反派”还有这样的能量？此外，如果毛主席反对暴行，为什么不发一个最高指示——当年，伟大领袖每发一个最高指示，那是要全国学习、全民庆祝的；或者至少，伟大领袖可以再写一张大字报，《炮打高干子弟》嘛。高干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都能被毛主席打倒，还有什么高干是毛主席动不了的？当年，亿万人民守候在高音喇叭前，听到的最高指示可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戚本禹所谓的“资反派”的能量有多大？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他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戚本禹的回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戚本禹、江青等文革干将，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当年的戚本禹等人，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是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是担负着亿万国人生死祸福的政治中坚。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处文字，都可能经过体制的传达而无限放大，造福社会或成为巨大的社会灾难。权力中心的一点火苗，蔓延到社会上就可能是冲天烈焰。所以，进入权力的中心，是需要对社会、对国民承担责任的。可惜，这样一点基本的责任意识，当年戚本禹们没有，今天的戚本禹们，仍然没有。

戚本禹1968年被关押监狱，1983年经审判获刑18年。1979年《决议》出台时，戚本禹已经在监狱中被羁押11年。可以看到，戚本禹主要的刑期，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

但是，被江青送入监狱、主要刑期在文革度过的戚本禹，为什么不恨江青、不恨文革？

关于这一点，戚本禹的回忆中也有交代。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这是1968年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批示写在戚本禹的检讨书上。得到这个批示，戚本禹、关锋、王力三人，竟如获至宝。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

得到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的称谓，戚、关、王三人竟感激涕零。作为党员，在身陷囹圄之时，在意的不是是否违反了国法、党纪，而是毛泽东是否还称“同志”——这是怎样一种深刻的奴性思维？这样的奴性心理体现在一个个自称革命者的身上，岂不是绝妙的讽刺？

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称谓，两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道赦令，就是无上的恩典，直接关系祸福生死。

文革政治的病态，在文革余孽深情款款的回忆里，显露无遗。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文革干将，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仍旧怀念文革的主要原因。如戚本禹，在漫长的非法关押期间，戚大帅念念不忘的是：领袖称呼我“同志”了。狱中的戚本禹，时刻期待着领袖的再度召唤，重入军机，再掌大权。曾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戚本禹，不但没有为国民负责的意识，而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人身依附的喽罗心态。而这种喽罗心态，能伴随戚本禹至今，也可算是奇迹。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只需要稍作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是用病态心理写出的“病史”。这种病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戚本禹这样的文革干将，连基本的逻辑能力都失去了。这类“病史”，如果是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下，是没有任何欺骗性的。相反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文革的遗毒，随时可能再度肆虐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戚本禹的回忆，也是一个警钟。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

1968年，戚本禹先生因为被“误解”，看了一场电影，坐了10年苦牢。“上意从来高难测，”可怜戚本禹先生，至今仍在揣测。

□ 原载《共识网》

~~~~~

【亡灵祭坛】

那些留在大陆的民国精英的人生结局

• 米 糕 •

◇ 谢家荣

谢家荣（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4日），字季骅，上海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之一，著名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在基础地质科学与应用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是中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大庆油田的勘测与发现者之一。

谢家荣1916年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随后进入该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因工作成绩突出，第二年被选送至美国留学，1920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回到祖国，继续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职。

自1940年起，谢家荣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处长，以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勘探出了十余处重点矿区——湖北大冶铁矿、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白银厂铜矿、陕西渭北煤田……

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81名院士之一。南京解放前夕，胡适召集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动员他们去台湾。但谢家荣不愿跟腐朽没落的国民党走。他组织矿产测勘处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和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谢家荣先后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长，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

曾有数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全国各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有一半是出自谢家荣的门下。

1956年，谢家荣制作出一幅《中国含油远景图》，在中国划分出了22个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石油分布作出的最为全面的预测之一，其中就包括最为著名的大庆油田。

不过，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他所有的职位与头衔都被撤去。从此，他的名声像矿脉一样被埋了起来，在大张旗鼓宣传大庆油田发现者名单时，他的名字也从来没人提起过。

他再也没能做出什么成果。1962年，曾有人在中国地质图书馆看到日渐衰老的谢家荣，佝偻着背，在那儿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碰到熟人时点头轻声问声好，几乎不说话，偶尔抬起头来，表情麻木，手边的白纸上，一个字也没有。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被人往脸上吐唾沫……1966年8月14日早晨，妻子吴镜侬发现68岁的谢家荣在家中去世。身边留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和一张写给妻子的字条：“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由于当时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就像今天自焚属于暴力抗法一样，家人决定隐瞒他的死因，对外称心脏病突发死亡。

处理完丧事后，吴镜侬被接到女儿谢恒家住。但女儿、女婿单位的造反派仍借谢家荣寻衅生事，两次查抄谢恒的家。在谢家荣去世1个月后，吴镜侬也服药自杀。与丈夫一样，她也在身边留了两件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个是给女儿的字条：“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

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 ◇ 刘盼遂

刘盼遂（1896—1966），名铭志，字盼遂，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芦集乡（曾隶属于河南息县）刘套楼村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

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刘盼遂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一生从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著有《论衡集解》等书（《论衡集解》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许多著作、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日后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依据。他的同事、学生要查典故时常不翻书而直接问他，因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活字典”。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师大中文系的8名教授，只有刘盼遂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他没能逃过后来文革的狂潮。

1966年8月，红卫兵查抄了刘盼遂家，因为在他女儿的被褥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人民币存折，红卫兵就认定他家一定还藏匿了黄金。他们开始毒打刘盼遂夫妇，逼问黄金存放在哪里。因为交不出黄金，夫妇二人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不准吃饭，只给他们喝自来水管里的生水。经过几天的折磨，刘盼遂的妻子被活活打死。

目睹妻子死去的刘盼遂深受刺激，头朝下扎进了家里的一个水缸试图自杀，但被红卫兵发现后拖出。他们随后继续毒打这个已经70岁的老人，很快把他也打死了。

作为近现代少有的古典文献学家，刘盼遂将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书，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籍。在他死后，这些藏书也被洗劫一空。许多价值连城的善本古籍被焚毁或送去燕山造纸厂造纸，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被康生挑走。文革后，一部分书被归还，收入了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室和图书馆。

#### ◇ 饶毓泰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名俭如，字树人，江西临川钟岭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国际上早期研究斯塔克效应的光谱学家之一。

1913年，饶毓泰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研究低压电弧的电子发射速率的实验成果。同年8月，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邀请，饶毓泰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创建了物理系，并出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系的学生，很多人曾受教于他，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知名学者。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吴大猷便是其中之一。（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

此后，饶毓泰先后赴德国、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研究，在原子、分子光谱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47年，他回国继续担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北平解放前夕，他不顾威胁利诱，断然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坚决留在北平，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

1949—1951年，饶毓泰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5年6月被评选为新中国首届院士（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饶毓泰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而遭到审查，受尽凌辱、折磨。

1968年10月14日，素来沉默寡言的饶毓泰在教研室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他难过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二天后，他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的自来水管上上吊自杀。时年77岁。

#### ◇ 虞光裕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1970年5月30日），江苏金坛人。航空发动机专家，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机构的创建人之一。1956年领导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

1941年，虞光裕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到国民党成都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室工作，1944年赴美国和英国学习飞机制造和设计。1946年9月，由美国转至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厂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与英国合作的飞机设计工作。

194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良好的科研条件和舒适的个人生活，并拒绝了赴台的命令，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封锁，同高永寿、陆孝彭等爱国学者一起，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

1951年初，朝鲜战争爆发。除了给爱人留出生活费外，虞光裕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出，并主动申请到东北工作，被分配到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1956年，他成功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1962年，主持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新中国航空科研事业的开拓者遭到迫害，被下放到车间劳动。1970年5月25日，在拆卸旧锅炉劳动时，不幸被掉下来的通风管道砸伤，因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终年52岁。

文革结束以后，虞光裕得到平反。1979年2月19日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 吴宓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吴宓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192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学成回国，先后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西洋文学系教授，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他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后，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西洋文学系（后改称为外国语言系）教授。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1941年他被国民党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建国后，吴宓曾在重庆磁器口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不久因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前身），自此以后，一直在西南师院任教。期间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和西南师院院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被打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由于干不动重活，76岁的他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的折磨。腿伤稍好，他又被命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后，吴宓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严重，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但噩梦还在继续：批林批孔时，由于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 来源：网文

~~~~~

【抗拒遗忘】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 朱大可 •

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路和南京路，早已经是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的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飞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

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海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提醒，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错误。自先秦以来，这种乐器的演奏就为丧礼所专用。湖北民间自今还保留着“丧歌队”的传统，它是“击缶而歌”的一种历史遗存，它只能出现于死亡的现场，而不在喜庆和生命狂欢的典礼上。在我看来，正是对历史的错误记忆制造了文化笑话——用“丧乐”谱写开幕式的第一乐章。这个反面例证教导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无数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我们正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 from 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事，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4万张历史照片，都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的美妙素材。

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语境里，这个语词似乎只是一种文化隐喻，但足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本性。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每一种优秀的记忆，都能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场盛大的授勋仪式，无疑是普京个人的政治需要，却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正是索氏本人不顾生命危险，保护了那些最黑暗的记忆，并因此推动了俄罗斯的政治反思和社会变革。

把记忆提升到“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在2008上海书展上的演讲稿）

□ 原载“博客中国”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